甘守清贫　无怨无悔

姜玉卉 *

我的家乡在房山区北部山区，大石河中游的佛子庄村，历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、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民。父亲念过几个冬学，平常的写写算算拿得起来，算得上村中半个文化人。

父亲有点文化，头脑灵活，不想把自己死死捆绑在土地上。于是，从山里收购核桃仁、甜杏仁，运到城里卖。倒腾了几年，挣了钱，娶妻生子，还在广安门内广义街（王子坟胡同）置了房产，日子过得较殷实。

1937 年，卢沟桥七七事变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，国人惨遭屠戮。延安八路军总部派萧克、邓华、宋时轮率领两个团，组成平西抗日挺进军，开赴平西 12 个县，创建以百花山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。不久，包森来到大安山、南窖一带，打响平西抗日第一枪。1938 年 2 月，在长操村建立了房良联合县政府，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。

---

* 姜玉卉：房山区河北镇河南中学退休教师。

日本侵略者对我根据地施行疯狂的“三光”政策，给我抗日军民造成极大损失。日伪军在坨里、河南、河北、红煤厂、南窖、北窖、北峪、大安山修建岗楼，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、经济封锁，使得山里的物产运不出去，军民急需的物资进不了山。

父亲经营的山货生意做不成了，回到佛子庄老家。不久，八路军独立团工作队秘密地来到佛子庄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，发展入党抗日积极分子。父亲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，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，积极靠近党组织，在村里第一批秘密地加入了党组织。在村后玉米地里举行入党宣誓后，入党介绍人张令德对父亲说：“今后你不要进城做买卖了，安心村里的工作。你有文化，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。”父亲听党的话，城里的买卖彻底清了账，处理了房产。

很快村里建立了秘密党支部，父亲做了宣传委员兼粮秣员。为八路军征收公粮，秘密储存、运到根据地，有时独立团路过佛子庄，顺便将军粮带走。

1945 年日本投降，1946 年房良联合县政府从长操开进佛子庄，建立了村级政权，党支部、党员公开了，各项工作村民积极响应，比秘密时期顺利多了。1947 年，我独立团配合主力部队准备解放坨里、房山县城。父亲按上级指令，征集 5 万斤公粮，他日夜操劳，收集、存储、运输，确保公粮安全无损。1948 年，我百万大军包围了北平，围而不打，争取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。俗话说，军马未到，粮草先行，军粮的需求量更大了。按县民政科的指示，征粮队要到平原大量征集公粮。父亲带领

征粮队，在基干民兵武装保护下，来到房山城南一带，夜里到财主家收粮，留下借条，用马车、驴骡运到临时粮库。父亲与征粮队过手万斤小米，但他们吃饭要从自家带小米，到堡垒户熬粥吃。

当解放军驻军良乡、王佐、云岗一带时，县大队指令各村组建担架队。父亲召集佛子庄村部分民兵和妇救会员30多人，组成担架排，父亲任排长，带队驻南四位、北四位，紧随围城部队，随时听候部队召唤。不久，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被解放军消灭，天津解放。傅作义无奈，接受和平解放北平，担架队撤回村里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继续做村里工作。抗美援朝时期，他由粮秣员升任粮秣主任。征收公粮，组织妇女做军鞋，缝制慰问袋。记得母亲去姥姥家，我整天随父亲，背篓里放大秤砣和柿子干之类的零食。有时也随民兵到各家收军鞋，放在背篓里，背到村公所，晚上父亲在院里看守公粮、军鞋，我在村公所正房土炕上睡觉。

1955年农村建立初级社，父亲接任社主任工作。对入社，村民还抱观望态度，入社只有60多户。父亲带领社员千方百计使初级社增产增收，彰显集体的优越性。第二年转成高级社，全村600多户全部入社，父亲担任高级社社长。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，父亲任村党支部书记。

这期间，房山矿两次来人到我家动员父亲去矿山工作。第一次是1951年，房山矿西区要恢复煤炭生产，支援国家建设，

煤矿急需领导干部，在煤矿工作的四舅带着矿长到我家劝说父亲到煤矿任总务主任。矿长说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党员，又有文化，有做粮秣主任的工作经验，去矿上担任总务主任一职最合适。父亲牢记党组织的嘱托，好好在村里为村民服务，没有去矿山。

第二次是1958年，房山矿邀请父亲去食堂做管理员工作，家属能转城市户口，家属区还给房子。从个人利益上看，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从农村到工业区，吃皇粮，挣工资，比农村优越，但父亲不为所动，仍然坚持在村里工作。每当4个舅舅提起此事，总怨父亲死心眼儿，守着农村苦日子，可父亲心里坦然。

村里成立“革委会”，父亲作为老干部的代表，进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。后来，父亲带领村里百十号民工去修陈磁铁路。工程结束后，公社党委安排父亲去了黑龙关水库筹备处。因地质不达标，不能建水库，8年后，筹备处撤离。公社领导嘱咐村干部，好好照顾老书记。村领导将父亲安置在大队部接电话，收发信件，发放村民订的电视报，接待外调人员。当时村干部的酬劳是几十元钱，根本养不了家，都自找活干，村民有事晚上去干部家谈。队部琐事由父亲应酬，干部也省了心。

父亲72岁那年，冬雪天在队部门前滑倒，虽无伤着，做子女的牵挂，怕今后有什么闪失，劝父亲不要去队部值班了。自此，父亲在家颐养天年。父亲在村里工作30多年，曾被上级评为“支前模范”，多次选为公社、县级人大代表、模范共

产党员，得到百姓的爱戴，德高望重。上下连村的人知道我是姜书记的大儿子，对我说：“你父亲的人品好！像你父亲那样的农村干部少见！”

1990年，父亲去世，乡党委来人与村党支部共同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。很多村民前来祭奠，有几位村民跟我说：“老书记性情好，对村民从不发态度，为大伙办事，没有一点私心！今天要抬老书记一膀子，不然对不住他老人家。”当灵柩经过村街，两次停下来，村民在灵前祭奠。一位拄着拐杖、走路蹒跚的老人，在父亲灵前跪着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好，好人呀！”老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看羊圈的，没儿没女。记得我上小学、中学时，每年春节前我的背篓里放两颗白菜、2斤猪肉、5斤白面，随父亲看望他。还有看柿子场的、蜂场的、饲养场的孤寡老人，春节前父亲都要逐一去看望。

父亲走了，他一生听党的话，甘守清贫，无悔不悔！